

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情感优势、可行路径与策略创新

——基于华东Y市的实证调查

杜沙沙¹, 胡鹏辉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南京 210009; 2.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群团组织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借助“优势识别—可行路径—策略创新”的分析框架, 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势在于团结动员、自觉参与、群众信任和联系服务。群团组织通过识别引导、凝聚共治、资源积累和回应修复等方面赋能情感治理。由此, 情感治理作为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行路径值得探究。情感治理对于基层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于优化基层心态建设、激活基层参与动力和助益基层舆情应对。群团组织践行情感治理的策略创新包括构建扁平化和专业化组织体系、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工作机制以及延展群团品牌项目的价值链条。

关键词: 基层治理; 群团组织; 情感优势; 情感治理; 实践创新

1 引言

基层治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 更是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推进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基层社会中,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与广大群众有着天然联系, 能够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把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汇聚成强大动力, 是“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力量”^[1]。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 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 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2]。

新时代背景下, “党建带群建”的工作原则, 为群团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密切联系群众, 更好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基本遵循。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势在于其拥有专属阵地、组织网络、成员基础等治理资源^[3], 并且, 群团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更加亲民化^[4]、多元化^[5], 治理技术更加专业精准和柔和适宜^[6]。当前群团组织在参与

作者简介: 杜沙沙,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讲师, 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干部激励、情感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胡鹏辉, 华中科技大学,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项目来源: 202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苏基层治理中干部情感激励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3ZZC003)。

基层治理中已取得社区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精准服务居民与民生保障、矛盾调解与动员参与社区事务等成果^[7],但仍面临工作权限和能级有限、工作任务重复和资源浪费、阵地小微与整合不够、目标失焦和方式模糊等挑战^[8]。

学界目前对于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偏重组织和制度维度,研究主要从体制机制运行切入,探讨群团组织如何通过结构整合、功能调整与规则适应,被系统地吸纳并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就组织模式而言,群团组织趋同于党政部门工作的决策程序和考核标准,导致群团工作重心容易转移至程序正确和政策检查^[9];群团组织的动员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为主,社会化动员程度不足^[10]。就工作制度而言,群团组织在开展业务时过度依赖行政命令、上级指示和审批报备等行政化手段,市场机制和社会协商手段的相对缺乏易导致其工作错位和失位^[11]。群团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嵌入型桥接”,试图通过组织下沉来激活基层治理网络,增强治理韧性。这一进路将群团组织视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参与治理的关键在于自身组织形态的现代化转型及其与治理结构的有效耦合^[12]。

就情感治理而言,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理论,缺乏与具体治理主体相结合的实证探究。情感治理是以人的体验世界为核心,通过运用一系列制度关怀和道德伦理,调动情感资源,使用情感策略,为社会各类群体提供情感认同、情感支持和情感参与,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社会温度和活力^[13]。情感治理与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相比较,它存在务虚性、长效性、隐匿性等特点^[14],这也导致关于情感治理的实践载体讨论陷入两难境地。从整体主义治理理论出发,学界认为情感治理载体应该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等多方协同展开,以促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共治^[15]。但此观点中,情感治理由于政府、行业、部门的“条块”边界,容易走入“部部管、样样松”的局面,并且导致了诸多情感治理相关的项目、活动、资源的重复和浪费。

另一方面,从党建理论出发,情感治理由党建带动,以政治引领和意识形态建设为主,从而塑造全社会全链条的爱党爱国的政治情感,形成社会共同体意识。这又导致在基层实践过程中,情感治理容易被简化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16],导致其包容、疗愈和激励功能有所不足,难以适宜地形塑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多元主体性价值观联结,以形成生活共同体、职业共同体、公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17]。

综上,本文旨在探索更好地促进“党建带群建”工作机制的长效落地、构建党群一体化的基层协同治理格局、共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与社会长治久安的治理路径。

2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研究尝试运用“优势识别—可行路径—策略创新”的分析框架,探究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优势,进而厘清群团组织通过情感治理这一可行路径参与基层治理的线索,并提出践行这条可行路径的创新性策略。

2.1 理论建构:“优势识别—可行路径—策略创新”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为理解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但尚未形成一个能够系统解释其参与可行路径及其践行策略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弥补这一研究缺口,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旨在构建一个动态相扣的理论模型,其内在逻辑在于揭示一个组织如何识别并激活其优势资源,通过找准并设计有效的转换路径,并最终通过策略安排保障其行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而达到特定的治理目标。资源基础观与协同治理理论分别从微观组织能力与宏观系统结构两个层面为本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资源基础观提供了从优势识别到路径转化的递进关系理论解释。组织的持续发展优势源于其拥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且能被组织有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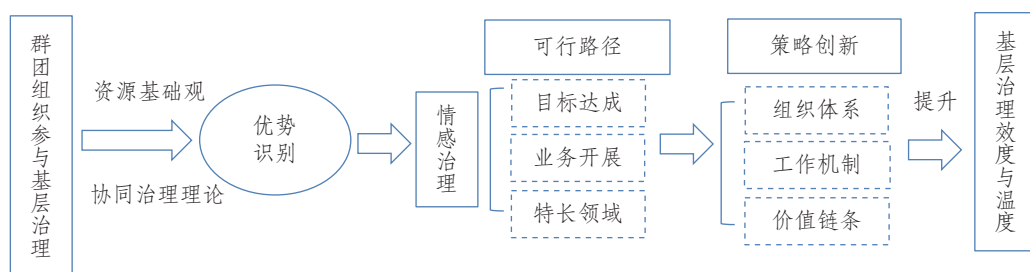


图1 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分析框架图

用的独特资源与能力^[18]。同时，资源必须通过一系列精准适配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流程才能转化为实际绩效。从资源基础观视角看，可行路径转化是激活优势，实现其治理价值的必由之路。同时，协同治理理论为策略创新提供了规范性理论与方法指引。在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格局下，基层治理依赖于跨部门、跨领域的持续性协作。该理论强调建立以共识为导向、基于正式制度安排的伙伴关系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运行机制^[19]。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协同策略创新，将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可行路径注入一个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组织的运转获得更稳定的资源输入、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更强大的执行合力，从而确保了组织发展和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可持续性。

因此，基于现有研究不足以及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从情感维度理解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势识别、可行路径和策略创新。本文期望不仅能够丰富和深化对群团组织治理角色的理论理解，弥补现有研究在微观互动与人文面向上的不足，同时也为优化其实践模式、释放其在促进基层社会融合、提升治理温度与韧性方面的潜能，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思路与实践启示。

2.2 研究方法

课题组于2023年11月选取华东Y市作为调查地，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该市社区办公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和群团服务中心共13处地点展开参与式观察。同时，课题组围绕“群团组织的优势功能有哪些？群团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与路径怎

样？群团在未来参与基层治理时应该如何创新？”等问题展开结构式访谈。本次调研访谈群团干部共计24人。其中，被访者包括Y市、县（区）政法、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红十字会分管负责同志共16人，镇、街道、村、社区负责人共8人（见表1）。课题组分别于2024年8月、2025年7月针对这些调研点展开回访，分别以个人访谈和座谈会的形式再次访谈了其中11位群团干部，形成历时态访谈摘录系列3本。同时，课题组收集调研点群团工作年度报告、群团干部个人总结、群团上墙工作制度等文字材料15份。访谈材料经过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之后形成核心类属，以支撑本研究分析结论。

选取Y市作为研究案例，首先是因为Y市具有研究课题需要的信息前沿性与集中性。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的先行区，Y市群团组织在职能拓展与工作创新方面处于较高水平。Y市共青团、工会、妇联和残联等屡获国家级、省级先进工作殊荣，这使得Y市能够集中呈现群团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当代实践中的最新形态。同时，它也能集中反映当前群团组织参与治理的挑战与可能路径，为理解该现象的时代特征提供窗口。其次是Y市提供了观察群团组织融入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宜情境。该市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和较高的整体治理水平，为群团组织深度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提供了成熟的制度环境与实践空间。在此情境下，群团组织如何与既有治理体系互动、整合并发挥优势功能，其过程和机理表现得更为充分可见，为剖析该现象提供了极具分析价值的经验场域。

表1 访谈对象表

编码	性别	级别	单位	职务
01	男	市	共青团	副书记
02	女	县(区)	共青团	部长
03	男	县(区)	共青团	部长
04	男	县(区)	共青团	部长
05	女	市	妇联	副主席
06	女	县(区)	妇联	部长
07	女	县(区)	妇联	部长
08	男	市	工会	部长
09	女	县(区)	工会	部长
10	男	县(区)	残联	副主席
11	男	县(区)	红十字会	秘书长
12	女	市	政法	副书记
13	男	县(区)	政法	副书记
14	女	市	民政	副局长
15	男	县(区)	民政	处长
16	女	县(区)	民政	副处长
17	女	街道	AS 街道	副主任
18	女	街道	BV 街道	副书记
19	女	街道	CX 街道	中心主任
20	男	街道	BN 街道	办公室主任
21	女	社区	SY 社区	书记
22	女	社区	AD 社区	书记
23	女	社区	YP 社区	书记
24	男	社区	YS 社区	书记

3 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情感优势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这是群团组织的根本定位和政治责任。桥梁纽带作用作为群团组织的根本定位和政治责任。桥梁是沟通 and 连接,是刚性的,象征着一种责任,需要认真负责、不折不扣地履行;而纽带则是依靠和联系,是柔性的,象征着一份感情,需要耐心细致、真心实意地培养^[20]。纵观历史,自革命时期起,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组织便通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组织共同行动,在斗争中培育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奠定了其情感凝聚的基因^[21]。群团组织的情感优势已逐渐发展为基层治理的关键维度,旨在构建一个有温度、有韧性的情感共同体,从而有效调动社会积极性、增强治理活力^[22]。因此,群团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基层治理的独特优势不仅体现在制度身份与组织网络上,更蕴含于其情感凝聚的核心优势之中。

近年来,情感治理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情感是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23],其核心在于回归人本价值及其主体性,通过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弥合治理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鸿沟^[24]。若将情感治理视为一个“联结—弥合”的动态现实^[14],其大致可分为大众情绪识别与引导、多元主体共识凝聚与参与、积极情绪资源积累与生产、群众需求回应与创伤修复等环节组成。各个环节之间循环促进,构成了一个从认知到行动、从积累到维护的完整治理循环,推动情感治理从策略性工具内化为可持续的治理生态。识别引导情绪为共治与修复提供前提,凝聚共治是治理资源积累的关键场域,也为修复提供主体。积累的情感资源为所有环节提供动力和缓冲。有效的需求回应与创伤修复则能防止累积的积极情感资源耗散,并反哺更精准的情绪识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群团组织的情感优势至少在四个方面能够转化成可行的情感治理路径。

3.1 团结动员优势赋能情感治理的识别引导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重视发挥群团组织团结动员群众干事创业的重要作用。”群团组织作为党联系特定社会群体的“桥梁纽带”，其核心优势在于深入群众的组织网络与情感联结能力。这种广泛温和的团结动员优势能够有效赋能情感治理的基层情绪识别引导机制。在情感治理的动态过程中，情绪识别是启动有效治理实践的原点。它并非简单的信息收集，而是一个系统性群体感知与意义解读过程。群团组织与工人、青年、妇女和残疾人等特定社会群体的天然联结构建了情感治理的基层嵌入式情绪感知网络^[25]。相较于行政体系的科层化信息传递，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残联等群团组织具有组织覆盖广、成员身份多元、贴近特定群体的结构性优势。它们扎根于企业车间、学校班级、社区楼栋等社会末梢，能够以内群身份捕捉职工权益焦虑、青年发展困惑、妇女儿童安全、残疾人歧视等细分领域的情绪信号。

进而，群团组织运用去行政化动员方式展开基层情绪的正向引导。情感治理不仅需要识别情绪，更需对消极情感进行正向引导。群团组织凭借其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共同利益认同，能够规避以行政命令的刚性方式展开群体内部的柔性动员工作，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价值叙事。这种引导方式避免了生硬说教，依托群体内部的示范效应和同伴影响，使积极情感的培育更具感染力和可持续性。

“之前接到有家老厂要搬新区。工会的小王在‘职工之家’打乒乓球时和我们诉说认为这不仅是经济补偿问题，里面有很强的社区归属焦虑。后来我们发现还有部分职工也是这个想法。于是，工会牵头组织特别活动。活动目的在于怀旧的同时也展望新厂区蓝图。活动后，我们成立了搬迁互助小组，大家的情绪平稳多了。”（092408）¹

3.2 自觉参与优势培育情感治理的凝聚共治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群团组织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重要平台。群团组织特别是人民团体是广大群众依法、有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渠道。”自觉参与优势源于群团组织成员基于认同、兴趣或利益纽带的自愿结合，其参与行为具有主动性、深入性和可持续性。群团组织的自觉参与优势对其培育情感治理的凝聚共治机制具有促进作用。凝聚共治机制是以情感认同与联结为核心驱动力，将多元社会主体有机整合^[26]；通过制度化平台与情感化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共同致力于化解情感矛盾、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增进社会团结的系统性合作模式。

一是群团组织成员的自觉参与超越了外部动员所带来的工具性参与局限，构成了情感治理协同网络得以内生性生长与稳固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它由内部生发、带有情感温度，能降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交易成本与协商摩擦。二是它提升共治执行的执行效能与人文深度。在由多元主体共同响应的治理过程中，群团组织成员的自觉性与主体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宏观的治理目标，创造性地转化为契合本群体文化心理与情感接受模式的微观实践。三是它为情感治理的凝聚共治机制提供了长期存续的内生动力。基于自觉认同所形成的情感共同体责任能够防止协同治理实践因项目周期结束或外部资源撤出而难以为继。自觉参与培育的不仅是对组织的归属感，更是成员间横向的互助伦理与集体认同，也是实现情感治理目标，即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关键力量。

“‘青年社区规划师’项目，最初就是几位热心青年在工会和团委的线上社群里自发讨论起来的。他们对自己社区的公共空间改造有情感归属，也有想法创意。这种自发形成的关注，我们没去命令他们，而是立刻捕捉到这种情绪需求和创

¹ 访谈摘录编码规则：前两位数字为被访者代码，后四位数为访谈时间的年份、月份。

意,团委提供小额基金,工会联系辖区企业提供物料,社区负责协调场地,共同建设美好社区。”(042311)

3.3 群众信任优势助力情感治理的资源积累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推动群团组织勇于改革创新,通过创造性工作增强发展活力、赢得群众信任”。群众对于群团组织的信任根植于群团组织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长期的历史纽带、制度化的代表身份以及日常化的服务接触。这种基于身份契合与持续互动产生的深度纽带,使群团组织在群众信任积累中扮演枢纽角色。信任是情感治理资源积累的关键要素。资源积累机制是通过系统性的社会互动与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资源进行持续培育、流通与增值,从而转化为可支撑长期治理效能与社会韧性的结构性资产的过程。该机制强调情感不仅是个体体验,更是一种可生产、可储存、可动员的集体性治理资源^[27]。群团组织赢得的群众作为可靠中介,能够将体制的合法性资源与政策关怀,以更具亲和力与说服力的方式传递给群众,将政治认同有效转化为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认同,实现基层治理的情感资源积累。同时,群团通过组织共同活动项目,为不同群体间创造大量正向的信任互动机会。在这种有组织的互动中,横向的成员信任、互惠规范与共同体意识被不断生产与强化,实现信任这一情感资源的再生产。

“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这是一种天然信任,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大资本。很多时候进行工资协商时,职工愿意对我们说真实想法,资方也认可我们协调的公正性。它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对话起点,而不是对立。许多矛盾都是在信任氛围中找到了解决方案。”(082507)

3.4 联系服务优势强化情感治理的回应修复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指出,“支持群团组织加强服务群众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作。”同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强调,“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群团组织所具备的联系服务优势指的是它能够深入且富有人情味地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公共需求和情绪痛点展开持续精准的服务回应。这种精准服务回应是强化情感治理回应修复机制的基础。情感治理的回应修复机制是指治理主体在面对社会矛盾、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以及关系裂痕时,所采取的一套及时感知、有效回应、柔性疏导与系统性修复的动态过程^[28]。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解决触发性事件本身,更在于通过服务和介入过程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疏导淤积的负面情绪,恢复乃至提升社会情感健康。

群团组织能够将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广泛的社会资源相连接,针对不同情感创伤与利益受损情况,灵活组合政策解释、心理疏导、实际帮扶、关系协调等多种工具,提供“一案一策”的综合性修复方案,从而在解决表层诉求的同时,致力于深层情感纽带的愈合与社会支持的再造。这种基于制度性身份、历史性纽带与日常性互动之上的群体嵌合所具有的适配性服务,使得情感治理超越模糊的关怀表达,迈向对社会需求的靶向介入与高效满足。

“曾有一位育儿期母亲,经常在业主群里发表极端言论而引起负面风波。街道干部劝阻无果后,我们妇联介入了。了解后,我们发现是因为育儿压力和家庭矛盾导致的情绪宣泄。我们迅速提供免费疏导,邀请她的丈夫参与家庭工坊,并协调社区托管中心提供育儿服务。最终,问题得到解决,她还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062408)

4 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行路径——情感治理

情感治理作为一种聚焦于社会成员情绪体验

与情感关系质量的治理范式，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发挥着整合社会心态、优化治理过程与应对复杂风险的系统性功能。群团组织通过参与基层治理的情感优势，将情感治理视为一种可行路径展开优势转化。这将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嵌入柔性治理的人文关怀，达成基层治理理念中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倡导，绘就兼具效能与温度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图景。

4.1 情感治理的目标达成优化基层心态建设

情感治理以社会成员情感状态的疗愈、包容、转化与激励为目标，这符合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心态健康、促进社会整合的根本要求。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活力，不仅依赖于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制度规范的约束，更依赖于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与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情感治理通过提供心理支持、接纳差异、引导负面情绪向建设性方向转化，激发集体荣誉感与奉献精神，直接作用于社会心态供给和预防矛盾激化^[29]。这种对情感生态的主动塑造，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情感资本与心理基础，是维持基层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深层工程。

情感治理的目标达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心态积极健康的社会单元，其内部摩擦成本更低，合作意愿更强，公共政策的执行阻力与后续矛盾发生率显著下降。同时，情感治理目标的达成赋予了基层治理温度。当个体社会成员的痛苦被疗愈、差异被包容、贡献被激励时，基层治理便不再仅仅是刚性管控，而成为可感知的关怀与支持。社会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得以实质性增强，基层社会由此散发出基于人际关怀的温暖特质。

“我们社区聚集了不少四十至五十岁的纺织下岗女工。她们普遍失落感较重，相互抱怨多，对社区事务冷漠，对街道服务也吹毛求疵，经常投诉。和妇联合作后，我们意识到仅推送招聘信息效果甚微，关键要重建这个群体的心态，‘织梦工坊’项目得到启动。经过妇联志愿者的定期上门‘拉家常’、新兴家政服务介绍、体验与培训、实习岗

位推介等‘组合拳’，她们顺利地适应了新行业，还带动了社区其他待业妇女就业。”（212507）

4.2 情感治理业务的开展方式激活基层参与动力

情感治理主要依赖自下而上的协商合作式业务开展方式。这有效弥补了科层制框架下的基层治理可能存在的反应迟缓、灵活性不足与公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治理事务具有琐碎性、突发性与高度情境化的特征，纯粹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往往难以精准适配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情感治理强调通过对话、协商、共建等柔性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的内在参与动力。在协商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建立信任^[30]。这种方式将治理过程转化为一个情感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不仅提升了决策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也培育了基层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助力形塑网络化协同的基层治理结构。

情感治理的业务开展方式带来广泛的社会协同，它能够激活分散的本地信息、知识与社会资本，使基层问题的解决方案更贴合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以此，基层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得到提升。此外，协同参与过程本身培养了民众的公共理性与自治能力，降低了长期治理成本。协商参与赋予民众话语权与主体性，使其从管理对象转变为共建主角，治理过程因而充满了尊重、对话与共创的民主气息，为基层治理的程序正义与社会成员的尊严带来温暖。

“前年我们企业搞新技术改革。职能部门的方案公布后，很多老员工产生了技能恐慌与抵触。我们工会这边建议不要强行推动，而是先组织多次协商会。管理层、技术专家、老员工代表面对面交流。最终，方案吸纳了职工关于‘阶段性培训’和‘师带徒过渡期’建议后得以完善。这之后，我们企业员工的参与意愿更强了。”（092408）

4.3 情感治理的特长领域助益基层舆情应对

情感治理的特长领域在于应对和转化复杂的

多元群体心态。它能有效提升风险社会下基层治理中公共舆情的管理质量。信息时代下,基层社会通常成为各类社会情绪与舆论的汇集点和放大器。情感治理凭借其对大众情感态度的敏锐分析能力、对多重利益相关方心态秩序的平衡艺术,以及对多样化观点的意义融合机制,及时识别社会情绪的“堵点”“痛点”与“燃点”。借助情绪疏导、意义重构和理性对话,促进极端情绪的软化、对立观点的调和,进而将可能引发社会撕裂的舆情危机,转化为凝聚共识的契机,维护基层公共领域秩序^[31]。

妥善及时的基层舆情处理需要通过提前介入情绪争议点,合理地疏导极端情绪,同时促进情绪对立方之间展开理性对话。就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而言,它能够将潜在的社会风险化解于萌芽,或将已爆发的舆情危机转化为共识构建的契机,从而以较低的社会代价维护公共秩序的长期稳定。此外,在面对社会成员的矛盾纠纷时,情感治理不回避矛盾,而是通过共情促进沟通来寻求最大公约数,以修复对立方之间已经受损的信任。进而,情感治理致力于在困难决策中,让各方感受到被郑重对待,从而维系社会团结最基本的善意。

“我们学校有一个关于学生实习学分认定的话题在网上快速发酵,情绪化表达居多。团委第一时间并非封堵,而是联合学生会、主要学生社团的负责人,组织线下开放讨论。邀请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解释,并坦诚当前客观限制。同时,鼓励学生提出建设性替代方案。线上,我们引导各学生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分享线下讨论达成的共识。舆情很快从情绪宣泄转向了对具体解决方案的探讨。”(042311)

5 群团组织践行情感治理的策略创新

群团组织可以通过情感治理这一可行路径参与基层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与治理温度。面对基层现实和时代挑战,群团组织需要积极展开情感治理实践的策略创新,以保障该路径在基层治理中持续发挥效用。群团组织在进行策略创新时应

该考虑以下挑战^[32]。一是面对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的数字社会,传统科层化与行政化的工作机制已难以完全适应群众需求。群团组织的情感治理实践策略创新须以机制体制重塑为前提展开。二是为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破解资源约束与提升服务效能,传统依赖行政资源的群团工作机制在应对多元化社会需求时显露出局限。这要求策略创新需要强化群团工作机制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趋势。三是时代变革背景下,数字社会的来临催生虚实结合的社会空间,社会成员的情绪体验趋向虚拟化。策略创新需要聚焦现实场景,努力挖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刻价值,匡正大众情感能量导向。

5.1 构建扁平化和专业化群团组织体系

构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扁平化与专业化组织体系,以便于群团组织缩短与群众之间情绪感知与回应服务距离,提升情感支持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细腻、精准的情感治理能力。群团可延伸组织触角到社区、园区、楼宇、企业、农村、新型社会组织上,做到行业领域、社会集体全面覆盖。这能缩短群团组织与群众的情感距离以实现其需求的敏捷识别。同时,促进其与基层治理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群团组织服务群众向“资源整合、社会参与”模式转变^[32]。这种模式转变是群团组织专业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它旨在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情感支持,将组织资源转化为情感治理资源。

例如,共青团协助社区梳理“矛盾清单”“需求清单”,成立社区青年议事协商会,采用“点单派单式”服务对接社区青年矛盾和需求。工会聚焦预防化解劳动争议纠纷。各级总工会、政法委等部门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帮助职工脱困解困,倾力打造工会在社区的纠纷化解工作室品牌,探索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化解劳动争议纠纷、服务企业和职工的工会法律维权新模式。妇联组织则可构建“网格+妇联”新模式,将自身嵌入网格,依托社区阵地参与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妇女儿童维权、妇女创业就业等工作。

5.2 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群团工作机制

群团组织推动工作机制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转型，旨在为情感资源积累建立可持续的支持源头与可调动的行动网络。一方面，探索市场化手段，撬动社会资源参与以优化情感治理的资源供给与转化效能。群团组织创新资源投入、管理手段、工作领域拓展等方面的变革。通过设立群团公益服务基金，引入项目化竞争与绩效评估，形成多元化资金池。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化动员，积极与基层组织结对，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健全社区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探索建立起以群团组织为枢纽，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联合服务模式。这不仅扩展了服务范围与深度，更在协同中促进了主体间的信任构建，使情感治理成为网络化共同体的集体实践。

例如，工会设立专项伤残公益基金，针对遭受职业伤害、重大疾病或裁员等事件的职工展开帮助。该基金可以通过向社会公开募集、企业定向捐赠等方式多元化筹资。共青团联合各相关部门发行“青年公益体验券”。它可以用于青年以极低的公益价格享受所在城市的文体项目，并实行资金来源多样化与小额自付方式结合展开。妇联构建“家庭支持者网络”的社会加盟体系。妇联作为枢纽型组织统一制定培训标准、服务伦理与质量认证体系，并链接社区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家政企业等社会力量来提供专业服务。

5.3 延展群团品牌项目的价值链条

群团组织以“党建带群建”的原则参与基层治理旨在畅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通道，持续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功能。通过情感治理路径，群团组织创新延展服务品牌与项目的价值链条以便通过微观叙事和信任体验，实现对特定社会群体价值观的柔性引导，引领群众走出信息时代的价值迷茫。这是群团组织对新时代社会关系的积极建构，也是其对新兴群体情感的有效回应。

例如，群团组织用活“青年大学习”“巾帼教育基地”“两微一端”等平台，依托大讲堂、服务

团等载体，走上讲台、走进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宣讲，开发文创产品，制作微漫画和微视频。同时，发动各类人员志愿参与群团活动，组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常态化开展助老助残志愿服务，凝聚社会各界达人及热心人士开展文明宣讲、困境帮扶、公益创作等各类活动。功能型、行业性群团组织针对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群体，通过非固定时间、非集中的灵活方式组织群团活动。

6 结论与思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党建带群建，更好履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情感优势在于团结动员、自觉参与、群众信任和联系服务。这些优势从识别引导、凝聚共治、资源积累和回应修复等方面赋能情感治理。情感治理作为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行路径发挥着优化基层心态建设、激活基层参与动力和助益基层舆情应对的积极作用。群团组织践行情感治理的策略创新可从构建扁平化和专业化组织体系、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工作机制和延展群团品牌项目的价值链条展开。

在推动群团组织践行情感治理路径的过程中还需警惕两个可能的偏差。其一，过于放大物质愉悦对于情感治理的效用。群团活动过分强调金钱和物品对于群众的情绪供给价值，可能致使情感治理的目标实现停留在形式之上，不利于社会成员自主、自尊和自省。一方面，过度物质援助可能导致受援者对援助形成依赖性，减少其自力更生的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单一强调物质援助可能导致被助者的弱势心态，从而影响其自尊提升。其二，将情感治理与娱乐群众简单等同。群团活动或项目中过度强调娱乐价值和休闲性，可能导致情感治理目标表面化，以至于参与者对群团组织的真正使命和目标产生误解，模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解决方案。同时，娱乐

化的群团运作致使群众参与情感治理的动力短暂化。随着娱乐效果消退,参与意愿和活动拓展均难以维持下去,影响群团组织长远发展。

责任编辑:梁思琪 校对:梁思琪 王妍舒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EB/OL]. (2015-07-09). <http://syss.12371.cn/2015/07/09/ARTI1436445776578871.s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 (2021-07-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
- [3] 褚松燕. 基层治理中的群团组织: 组织社会的嵌入型桥接[J]. 治理研究, 2023, 39(2): 20-32+2+157.
- [4] 李杏果. 中国工会参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理论月刊, 2022(2): 59-67.
- [5] 苏康, 王佃利. 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4): 52-60.
- [6] 杨柯, 唐文玉. “群社协同”: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以H市妇联协同女性社会组织为例[J]. 思想战线, 2022(2): 52-60.
- [7] 王杨, 邓国胜. “元网络”视角下群团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及机制——以北京市首个“侨之家”社区建设为例[J]. 中州学刊, 2023(3): 100-108.
- [8] 褚松燕. 改革开放以来的群团组织研究: 回顾与展望[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2(5): 99-111.
- [9] 褚松燕. 政策性群团参与社会治理: 改革、创新与战略构建——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9): 85-90.
- [10] 解丽霞, 徐伟明.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J]. 理论探索, 2020(3): 69-75.
- [11] 黄峰, 姚桓. 对新时代群团组织改革的初步思考——基于对上海群团组织改革的调研[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6): 65-71.
- [12] 康晓强. 国家治理视野下群团组织转型的困境与出路——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共青团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8(3): 48-57.
- [13] 杜沙沙. 情感治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温度”之维[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1-41.
- [14] 李慧龙, 尉馨元. 比较视野下情感治理的实现机制: 一个“联结-弥合”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8): 71-78.
- [15] 胡宝珍, 欧洲华, 刘静. 新时代“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之建构——基于福建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 东南学术, 2022(2): 126-133.
- [16] 刘丽莉, 温碧霞. 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情感治理实现机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5): 120-129+140.
- [17] 成伯清. 大团结视域下社会组织的统战意义[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2): 18-20.
- [18]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19]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 [20] 共青团云南省委, 架起“连心桥”, 当好“枢纽站”[EB/OL]. (2024-11-15). <http://ynylxf.cn/Html/News/2024/11/15/463102.html>.
- [21] 胡献忠.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群团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J]. 青年探索, 2021, (2): 16-26.
- [22] 廖瑛, 卢永毅, 周秀芬. 关于发挥群团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情感治理优势的建议[EB/OL]. (2017-06-14). <https://www.shszz.gov.cn/shszz/tagd/content/244c4ca8-0022-40f4-ac5d-e122ed64b9e4.html>.
- [23] 崔希玉. 构建情理交融的基层治理模

式[EB/OL]. (2026-04-03). https://cssn.cn/shx/zlyzx/202604/t20260403_5979304.shtml.

[24] 吴晓凯. 当代社会情感治理的逻辑演绎与实践反思[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2): 152-160.

[25] 王丽萍. 国家治理中的情感治理: 价值、逻辑与实践[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9): 87-92.

[26] 孙璐. 社区情感治理: 逻辑、着力维度与实践进路[J]. 江淮论坛, 2020, (6): 139-144.

[27] 陈洪连, 李慧玲. 情感治理: 民心政治的实践与表达[EB/OL]. (2024-06-08).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6/t20240607_5757723.shtml.

[28] 侯万锋.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乡村情感治理: 维度、困境与进路[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2):

101-108.

[29] 魏航, 彭文洁, 石楠. “氛围”: 情感治理的新路径——基于P市文明城市“模范氛围”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47-54.

[30] 陈云凡. 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基于H社区的个案观察[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2): 53-61.

[31] 史臣, 邢朝国. 风险控制与情感治理: 本土社区矫正的实践逻辑与行动策略[J]. 社会学评论, 2023(3): 239-256.

[32] 胡若雨. 群团组织在新时代的改革取向[J]. 理论探索, 2019(1): 66-69.

The emotional advantages, feasible pathways,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s of mass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Y city in Eastern China

Du Shasha¹, Hu Penghui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C.P.C. Jiangsu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Mass organizations are a crucial for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Utiliz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dvantage identification—feasible pathways—strategic innovation", field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trengths of mass organizations in participating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ie in their ability to unite and mobilize, foste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maintain public trust, and provide integrated services. They empower emo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identification and guidance, cohesive co-governance, resource accumulation, and responsive remediation. Consequently, emotional governance, as a viable pathway for mass organizations to engag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rits exploration. The positive role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ies in optimizing the foundation of grassroots mindsets, activating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aid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ntiment. Strategic innova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by mass organiz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flattened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xploring market-oriented and socialize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extending the value chain of mass organization branding projects.

Key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mass organizations; emotional advantages; emotional governance; practical innovation